

“邪教”在行动

——河南某高校“呼喊派”传教案剖析

刘平

Abstract: A vast scale "anti-evil cult movement" launched in China from 1999, which the first target is Falun Gong. Under the pressure, various types of "Evil Cult"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identified changed their names uninterruptly, and secretly preached to all levels of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organized missionaries appeared in colleges. Take the "Shouters Sect" preached into a university in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 the detailed strategic of the "Shouters Sect" in colleges and its corresponding in this paper. In the confrontation of preach and anti-preach, infiltrate and anti-infiltrate, about university recognized that generation of "evil cult" has specific social and religious roots, it has a feature of long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new trends of "evil cult" to infiltrate universities, we should made a useful exploration In the aspect of inculcate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avoid straying into "evil cult".

Keyword: Shouters Sects; Universities; preach; Cults

在当代中国，“邪教”主要是指不被政府承认的民间教派，尤其是指那些没有经过合法登记的基督宗教系统（或带有相应色彩）的、“异端”或“新兴”教派。1980年代以来，呼喊派、被立王、主神教、全能神等大约20种“邪教”教派以及种种土生土长的传统“邪教”会道门，不时出现，有的甚至引发大案要案。它们与中国现行法律、宗教政策与意识形态发生严重冲突。对此，中国政府除了从法律上予以严惩，还在意识形态、宣传出版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相应地，学术界、宗教界、法学界对“邪教”问题也进行了广泛探讨。近年来，中共政府对于宗教、“邪教”等所谓“敏感”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加紧控制，但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展开研究。

1999年起，以法轮功为第一打击对象，中国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反邪教运动”，强力扼阻了“邪教”在中国的蔓延之势。高压之下，各种曾经公开的、颇为活跃的“邪教”教派开始转入地下。最近十年来年间，所谓“邪教”，看似销声匿迹，实则暗流涌动。它们不断改变名目，转换方式，暗中向社会各个层面传教（主流话语称为“渗透”），近年来更出现有组织的向高校传教的趋势——向高校传教的情形，以往也有，但一般是个人行为。高校是中共政府灌输、贯彻意识形态的重地，历来防守严紧，那么，“邪教”教派是如何向高校传播的呢？高校又是如何因应防范的呢？本文以“呼喊派”向河南某高校的传教为例，展开讨论。

一、“呼喊派”概况及其向高校传教的策略转变

(一) 呼喊派概况：历史背景、基本教义与现在情形

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某肯德基餐厅发生一起暴力事件，一名女子被六名行凶者活活殴打致死。视频播出后，社会为之震惊。随着案情持续深入的披露，行凶者的“全能神”背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邪教”的极大关注。后来，六名行凶者均已获刑，然而该事件的社会影响并未随之稍减。

“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实际神”、“七灵派”、“女基督派”，1989年由赵维山创立。赵维山原系“呼喊派”骨干成员，后自立门户，在基本沿用“呼喊派”教义、部分加以发挥的基础上创立了“全能神”教派。可以说，“全能神”系从“呼喊派”演化而来。此外，在中国，“被立王”、“主神教”等众多基督教背景的“邪教”教派，都或多或少能发现“呼喊派”的印记。在中国政府已明确认定的19（或21）个“邪教”组织名单中，“呼喊派”居首位，其衍变派系之众、影响之大，颇为深远。那么，“呼喊派”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呼喊派”历史悠久，由民国时期“小群派”演化而来。“小群派”即基督教聚会处，是地方教会的前身。“小群派”是基督教“属灵”派的一个分支，于1922年在上海组建，教派领袖倪柝声、汪佩真、李常受等人作为“七大使徒”。1924年，“小群派”设立福音书局，开始系统地宣传自己的宗教主张。1932年，“小群派”开始向北方传播，李常受先后在山东烟台和吉林长春建立地方教会组织。由于受到陈立夫等人的支持，“小群派”以“执事之家”作为组织机构，吸收了包括政界人士在内的大量信徒，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迅速。1946年，李常受主持上海、南京两地的“小群派”工作，地位仅次于倪柝声。

1948年，李常受发起“交出来”运动，号召信众将财产上交教会，同时其政治倾向也开始显露，将共产党视为“魔鬼”、“撒旦”。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李常受发动“为时局禁食祷告”，亲自在讲台上大声疾呼祷告：“求神划定长江为界，不许共军南进一步，如果共军要渡江，求神使他们全部淹死在长江中，像当初埃及法老的军队全部淹死在红海里一样。”¹这一“反共”立场对后来“小群派”的命运产生了致命作用。

到1949年，“小群派”在全国设有13个教区，约700余处地方教会，大半在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地区）。1950年代，以倪柝声被冠以“反革命罪”遭逮捕为标志，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小群派”加以公开打击。后来大陆的“小群派”大多加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²

¹ 蒋嘉森：《毒瘤：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群众出版社2001年，第28页。按，本文引用资料文献主要出自大陆，对其中的“政治”色彩不做评论。

²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期里，学界对于“小群派”、基督教本土化的研究较多（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的许多教派，如果不加入“三自”，则很容易被打入“邪教”之列）。随着温州等地区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张，中共地方政府的领导十分焦虑，近年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引起广泛反响的“拆毁教

1962年,李常受在美国创立“呼喊派”。李氏宣称“道的时代”已经过去,已转入以灵的办法“释放灵”的时代,同时将《圣经》中的“求告主名”引申为“呼求”,继而解释为“呼喊”,试图“用‘祷读’的呼喊方法,致使人的灵与神的灵混合调和,达到意志被动、心思空白的状况”。³所以,该教派在聚会仪式中常呼喊“哦主”、“阿门”、“哈利路亚”等,因而得名“呼喊派”。

与其他“邪教”教派一样,“呼喊派”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及严格的等级制度。刚加入的人称为“信徒”;负责宣传“教义”、发展信徒的称“工人”;直接负责管理“工人”和“信徒”的叫“长老”,也称片长;分管“长老”的叫“使徒”,并有授权与不授权之分,只有授权的使徒才能支配金钱、财物,才能成为“中华大陆执事站”的重要成员。“长老”、“使徒”可以给被发展的信徒起“灵名”,也称“灵号”。⁴“呼喊派”虽然使用基督教的名义(其在历史脉络中确实属于基督教本土化的一环),却往往被“三自”系统视为异端,直至被中国政府定为“邪教”。⁵1975年,李常受在台湾公开说:“我就是捣整个基督教的乱,搞得他们昼夜不安。牧师不能作了,组织不能有了。”⁶这种挑战自然容易遭到包括大陆“三自”系统在内的基督教的激烈回应。

在教义方面,“呼喊派”将基督教受《圣经》启示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传统信仰改为耶稣是父、是子、又是灵”的“一位三形”;曲解、贬低基督的身位,否认基督耶稣是万物的创造者,宣传“基督是受造者”,“是一个与常人一点不差的人”,“是一个有血统肉身的人”。不仅如此,呼喊派还贬低《圣经》在基督徒中的权威性,否认《圣经》是神的俗示,要信徒不必遵守《圣经》教训,“我们必须听活基督,而不是听字句《圣经》”。呼喊派曲解《圣经》教义,提倡“吃主”、“呼喊”、“祷读”,称“吃基督,就变成基督”,“呼求主,就是吃主”,“我们的吃法,就是呼喊主名,呼喊主就是吃主”,“只要一喊,主就在你面前”等。⁷这种“呼喊”的教义也构成了其行为特征。

“呼喊派”教义中还有许多激进观点容易招致中国“三自”与政府的反感,比如宣扬“世界末日”,称“主耶稣要来了,世界要毁灭了。不要耕种,不要建造房屋,不要娶嫁”等;声称“天上

堂事件”之发生,绝非偶然。

³ 蔡凌云、区应毓:《异端与邪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⁴ 陈智敏、张翔麟主编:《邪教真相》(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⁵ 按,1980年代后,中国不断出现一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民间教派,被政府定为“邪教”,这些教派名目繁多,其创立者一般使用基督教的名义掺杂某一种或多种经典、教义,建立一套独特的教规与教义,自立为教主,从事各种中国现行法律所不认可的活动。从中国法律角度来看,这些教派属于“邪教”;从这些教派的产生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将他们视为“新兴宗教”;我个人认为其属于基督教异端教派,在他国或可正常生存,在中国,如果不进入“三自”系统,则必然遭受打压。

⁶ 陈智敏、张翔麟主编:《邪教真相》(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47-48页。

⁷ 参见《荡涤尘埃》课题组著:《荡涤尘埃:新中国反邪教斗争》,郑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页。按,在世界各地,基督教存在难以数计的教派,他们各自拥有的教义形形色色,但只要其活动与当地法律不相抵触,一般不会受到打压。至于其教义之优劣长短,那是基督教内部的事情,中国之宗教生态则完全相反。

早已被主占领,地下现要我们去占领”;要求教徒不要以过正常的宗教生活为满足,要准备“在战场上享受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的筵席”;规定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在一地一处建造神的家”,实现“神统治的国度”;煽惑信徒要“与掌权者斗”;声称“基督徒不能独立,必须建造在一起”,无条件地接受海外李常受等人的指挥和控制;扬言要对国内教会进行“破碎”,把热爱共产党和政府,拥护“三自爱国会”的人清除掉。⁸等等。

1979年后,李常受将传教重点转向大陆地区,“呼喊派”随即开始向内地发展,他们以香港为据点,将广州作为其向大陆发展的门户,温州、鲁山作为重要基地,迅速蔓延至多个省份。到1983年,“呼喊派”组织已涉及20个省、自治区的360个县市,信众达20余万人。仅浙江一地,“在大约两年时间内,已从温州蔓延到金华、杭州、嘉兴、宁波、台州等7个市、地的31个县,教徒约达10万人”。⁹

1983年,“呼喊派”被中国政府取缔并受到严厉打击。1987年,“呼喊派”在河南、浙江等地再度活跃,如河南南阳地区成立“邓县工作区”,管辖南阳市、南阳县、西峡县、内乡县、淅川县、新野县、唐河县及邓县共8个县(市)的传教事宜。邓县一县,“共有呼喊派成员1215人(男340人,女875人),其中,骨干分子94人,设集会处109处,涉及全县20个乡(镇)98个行政村”。¹⁰政府再度出手,对发现者一一取缔。199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转发〈公安部关于查禁取缔“呼喊派”等邪教组织的情况及工作意见〉的通知》,明确将“呼喊派”定为“邪教”。当时共取缔以“呼喊派”为首的各类“邪教”之“组织机构和聚会点3万多处,捕判120多人,劳教200多人,治安处罚8万多人次,依法处理境外邪教组织渗透人员69名”。¹¹

(二)呼喊派传播指向的改变:瞄准高校

经过三次大规模取缔打击,中国对“呼喊派”的脉络体系、传播途径和成员构成等情况逐渐清晰明了,如曾在公安部任职的蒋嘉森对“呼喊派”人员构成概括为:一是原基督徒聚会处的部分教徒,这部分人受到原“小群派”领袖李常受的影响,转变为“呼喊派”骨干;二是经“呼喊派”拉拢的一些所谓“自发传道人”发展的无组织的信教者;三是一部分愚昧无知、文化水平低,被诱骗参加的农民。¹²

基于此,中国政府得以对“呼喊派”以农民、城市居民、下岗工人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传统模式进行了有效管控,达到“露头就打”的效果。这样一来,“呼喊派”无法按照原有模式如蔓草滋生,连绵不断。另一方面,声势浩大的“反邪教运动”在摧毁各类“邪教”组织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对人们防范“邪教”起到了“宣传引导”作用。

然而,“呼喊派”等“邪教”教派并未偃旗息鼓,其组织的传教和串联活动从未根绝。在大陆

⁸ 李秀清:《呼喊派的反动本质及其危害》,载《河南公安学刊》1992年第2期。

⁹ 江平:《民族宗教问题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331页。

¹⁰ 邓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邓州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68页。

¹¹ 王怀安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第6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81页。

¹² 蒋嘉森:《毒瘤: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群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的组织网络不断被摧毁的情形下，“呼喊派”海外指挥机构也在不断积累经验，变更方法，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便成了其向大陆渗透的一个重要前提。如何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程度发展呢？高校作为一个近乎完美的传播区域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从传播对象看，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期，与其他人群相比更易接受新的思想观念；他们多为独生子女，进入大学后要独立面对人生的很多问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极易产生挫败感，愿意接受外来的心理慰藉；逐渐僵化的教育体制促使大量“愤青”出现，他们往往对非正统的信息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在好奇心驱使下，容易接纳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相关信息。

从传播范围看，高校是一个人群高度密集的区域，动辄数万人，一旦找到突破口，便能迅速蔓延，形成规模。学生群体的特殊性还在于每个学生背后是一个或者多个家庭，如果有学生涉身其中，“邪教”很容易形成社会效应。

如此，“邪教”向高校渗透成为了一种必然。有研究表明，“邪教”组织在全国各高校活动的情况虽有差异，但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邪教”进行“思想渗透”的事件。¹³

以河南省某高校为例，近年来出现多种“邪教”接连向校园渗透的现象。2013年冬季，“东方闪电”向校园内传播，并试图在圣诞节举行聚会，后被公安机关发现、制止；2014年，国家安全机关发现该校“呼喊派”活动，经校方首轮排查即发现参与人数已达一百数十人，令校方更为震惊的是“呼喊派”在该高校内部设有基地，并已活动数年之久。

在中国的宗教生态条件下，提及“邪教”，人们头脑中都会立刻联想到神秘、淫乱、恐怖、杀人、迷信等标签，那么，“呼喊派”是如何突破人们的固有思维，顺利地获取部分高校师生的信任并使之皈依其教的呢？

二、呼喊派策略：“个个眼中有学校，人人心中有学生”

“呼喊派”的传播指向瞄准高校之后，开始以“个个眼中有学校，人人心中有学生”为传教活动指针，全力向学校和学生开展传教工作。关于“邪教”具体的传播路径，学界多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邪教”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根据“呼喊派”向河南某高校渗透的情况来看，人际传播仍然是其向校园传播的主要方式。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其发展信徒的主要策略有以下几种：

（一）从“源头”工程抓起

所谓“源头”，即“呼喊派”将刚入校的新生作为每年的工作重点。高校新生虽然大多已经成年，但由于在中学阶段经历的沉重升学压力与繁重的学习任务，造成他们成长经历单一，涉世甚浅，对外界事物和观念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他们很多人都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在遥远的外地求学，从情感上说，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举目无亲，亟需关爱。该校在排查谈话过程中，一位参加“呼喊派”的同学陈述：

¹³ 赵康太：《我国高校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我是从外地来的学生，当我刚刚踏入大学校门时，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交流的朋友，内心的凄凉可想而知。在我苦闷无助的时候，XXX 出现了，他告诉我有这样一个大家庭——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互亲互爱，相互扶持。听了他的描述，我非常向往。后来他带我去教堂，在那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读圣经，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兄弟姐妹们的情谊。

从“呼喊派”方面来说，向刚刚开始独立面对人生的大学新生传教，其难度自然比向高年级学生传教要小得多。“呼喊派”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在新生尚未正式接触到大学教育时便开始向其施加影响，以求“先入为主”。河南某高校在 2014 年开学时，“呼喊派”首先掌握了该校新生的宿舍信息，然后派出多路人员深入新生宿舍开展活动。

（二）利用同乡、相关家庭背景传教

“呼喊派”在该校传教过程中，颇为注重同乡会以及家中是否有人信基督教等因素。有人指出：“由于有着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邪教传播者在传递信息时往往诉诸情感，有人情味，双方易于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能较全面、深刻地领会信息含义，易于导致行为，传播程度深入。”¹⁴该校在排查谈话中，这种案例颇为常见，如 XX 学院魏某某同学这样陈述她与“呼喊派”的关系：

2012 年 5 月的一个下午，大概 6 点左右，在某某湖遇到两个 XX 学院的学姐，一个是 09 级的，163cm 左右，黑瘦，另一个是 08 级的，160cm 左右，白胖，但不知道姓名。她们与我搭讪，得知我不信教之后便接着询问家人是否信教。我便将我母亲信基督的情况告诉了她们。之后她们便向我介绍基督教的情况，并讲述《圣经》的内容……。

“呼喊派”成员常以高校里的同乡组织或同乡关系发展成员。对于陌生人，他们往往首先询问家中是否有人信奉基督教，如有，便立即进行相关教派信息的灌输，然后将该学生信息登记下来，作为以后发展的对象和活动召集对象。另外，同宿舍的同学也成为“呼喊派”成员发展的对象，如 XX 学院的一名女生便将同宿舍的五名同学全部发展为“呼喊派”成员。

（三）利用聚会传教

“小群派”非常注重聚会的作用，“每礼拜日由同工、长老、执事与信徒共同主持举行‘掰饼聚会’；此外还有讲道、传福音、祷告和交通（交流灵性经验）等聚会”¹⁵。“呼喊派”同样重视聚会的作用，因为“通过频繁的封闭式聚会交流，往往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建立新的认知结构和心里定势”¹⁶。“呼喊派”向该校传教时便采取了聚会形式吸引学生参加。

¹⁴ 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29 页。

¹⁵ 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第 279 页。

¹⁶ 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29 页。

据 XX 学院纪某某陈述:

2013 年 5、6 月份的一天下午, 在出学校的路上, 经过挨着图书馆的教师公寓时遇到几个女生与我搭讪, 邀我参加集体活动, 因当时有事, 便没有与她同去, 但将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了她。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 要走我手机号的那个女生邀我一起去家属院读圣经。我和 XX 进去后先读了《圣经》, 后进了一间屋子, 屋内有十几个学生, 一个 30 岁左右的男子知道我和 XX 没有“受洗”后便安排我们接受“洗礼”。之后我们开始做祷告, 七八分钟后结束。

又过了几天, 那个女生短信约我在图书馆集合一起读《圣经》, 到家属楼之后, 我看到有近 20 人在那里, 人数比上次多。活动内容是读《圣经》、做祷告。

另据 XX 学院的彭某某说:

XX 多次打电话和 QQ 信息邀我去聚会“洗礼”, 我并未理会。大概在四月份在一号餐厅前遇到她和上次一起读《圣经》的女生, 她们执意带我去一个家属楼里, 屋里一老一少正准备吃晚饭, 后来进来一男一女(可能是夫妻), 男的将我带到卫生间, 嘴里说着些什么, 将一盆水从头上浇了下去【刘平按, 即所谓“洗礼”】。

从上述两个案例我们发现,“呼喊派”成员甚至在没有向对方介绍该组织教义等方面的情况下, 首先向他们发出聚会的邀请, 以提高对方参与的兴趣,“事实表明, 不少起初出于好奇心来参与聚会活动的民众, 逐步为邪教所吸引, 成为邪教的一分子, 本来信心不是非常坚定的民众也可能逐步成为邪教的坚信者, 心甘情愿归属其教主领导”。¹⁷“呼喊派”正是利用聚会形式, 让学生接受体验式传播。我们要反思的是, 与现行逐渐僵化的教育模式相比,“邪教”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

(四) 利用异性、恋爱开展活动

相较于男性而言, 女性更易于使人放松警惕, 被人接受, 这一策略在“呼喊派”向该校的传播中也比较普遍。

据 XX 学院刘某某述说:

我第一次接触并参与活动是在 2013 年 4 月份的一天, 当时大概是下午 3-4 点, 我在南方某某湖最西侧读书。有两个女生与我搭讪, 其中一个叫 XX, 当时是 XX 学院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 另一个女生的名字忘记了, 皮肤很白, 应该是 XX 学院(1)或是 XX 学院(2)的。她们说自己是基督徒, 先向我讲基督教, 然后让我读《圣经》, 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刘某某在不认识她们的情况下, 第一次见面便在她们的要求下读了近一个小时的《圣经》。不

¹⁷ 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第 131 页。

久，刘某某便在 XX 的带领下参加了该组织的聚会和洗礼。

更有甚者，“呼喊派”以恋爱的名义引人入教。据 XX 学院汤某某说：

我第一次参加活动是在 2012 年十一过后不久。那时我刚考入 XX 大学，军训结束后第一节计算机课上认识了 XX 学院的王某，并开始追求她。十一过后向她表白，她告诉我她信仰基督教，要找一个有共同信仰的人谈恋爱。因考虑到正在追求她，为了讨她欢心便和她一起参加活动。2012 年 11 月，她在学校的小树林给我读了一段时间的圣经，当时在场的还有一名女生，但姓名不清楚，读圣经持续了一个小时。一个月后，我在王某的带领下参加了“洗礼”。

上述以异性、恋爱传教的方式，遇到的阻力较小，尤其是男生，很容易放松警惕，加入其中。该校这种异性传播的案例几乎未尝遭遇败绩，据统计，XX 学院确认参加“呼喊派”活动的男生全部经由女生发展。

三、高校应对“呼喊派”传教的措施

由上所述，向高校传教已经成为包括“呼喊派”在内的各“邪教”开展活动的重要指向。那么，作为贯彻中共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高校是如何应对、筑牢反“邪教”渗透的阵线呢？

（一）重视反“邪教”教育宣传，增强宗教知识储备

从该校情况分析，很多参与者并不能清晰地辨别“邪教”与宗教——很多陈述者只是提到读《圣经》、参加聚会之事，而不明了这些传教者的背景。这说明在其思想意识中存在着宗教认识的空白区域，同时也说明高校开展反“邪教”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面临如何处理学生之宗教信仰与参加“邪教”的关系。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政治、宗教环境来看，校方要想抢占这一空白的思想领域，必须利用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法制宣传教育、干部教师培训、学生培养方案等已有的载体与活动平台，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宣传教育实效，确保反“邪教”工作“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针对“呼喊派”向校园传教的现象，目前该校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树立正确的法律和宗教政策观念。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和宗教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 3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教育法》也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也就是说。即使是合法的宗教，也是不能在校园内进行活动的。对于这一点，高校各级领导有着清醒的认识，做好防范，在掌握一定信息后果断配合公安部门加以处理，避免“邪教”组织打着宗教旗号在学校活动。

2、集中开展反“邪教”教育宣讲。在全校师生范围内进行宗教信仰调查，掌握师生宗教信仰情况，认真排查落实，为反“邪教”工作提供依据；向全体师生宣讲反“邪教”知识，帮助师生认清“邪教”的本质与危害，引导学生增强自觉抵制“邪教”侵害的意识和能力；利用好学校展板、

网络等各种宣传媒介营造形式多样的反“邪教”舆论氛围,提高师生的警惕性;选购或编印发放反“邪教”工作有关知识读本、手册,丰富师生的法律、理论、宗教知识储备,筑牢思想防线。

3、发挥全员育人的强大作用。当今,全员育人已经成为中国高校教育的共识,反“邪教”教育更是如此。反“邪教”工作是一项系统的思想工程,如果仅仅依靠各级党的书记、辅导员等政工干部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利用好高校的政治课资源,将反“邪教”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内容,同时增设反“邪教”专题,将科学精神与正确的宗教观灌输到师生的思想中去。

(二) 设立反“邪教”专门机构,优化资源配置

从“呼喊派”之“个个眼中有学校,人人心中有学生”的行动口号以及反“邪教”工作的复杂程度来看,高校必须建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协调各方资源,共同应对。高校不仅要加强与公安机关等部门的信息、情报沟通,同时校内各部门联动,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1、深入排查,掌握“呼喊派”组织的网络体系。以已经掌握的名单和信息为线索,通过与“呼喊派”参与人员逐一谈话,以讲清邪教本质、危害和法律、政策、纪律为主,教育引导其深刻认识并如实提供参与“邪教”活动的思想动因、经过经历、上线联系人及组织者操纵者情况、活动内容与地点、一起参加活动的人员名单、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作用,以及通过自己发展了多少人与人员名单,要求被谈话人将所陈述的内容写出书面材料,然后根据谈话人提供的线索和信息,进一步深入排查,直至排查清楚。全面掌握“呼喊派”组织在学校的总体情况。

经过深入排查,“呼喊派”在该校的组织轮廓逐渐清晰:由下至上,有100多名普通信众,8名骨干,1名总负责人。将这一轮廓立体化,正好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基座是100多名普通学生信众,中间是负责日常活动召集和组织的8名骨干成员,顶端是1名总负责人。据了解,这名总负责人和其中4名骨干均为河南鲁山县人,这与“呼喊派”曾将鲁山作为重要基地有直接关系。

2、发挥学生组织作用。在当前体制中,高校的学生组织体系比较健全,校方应该充分利用基层班级和学生会、校内各类社团及各级党团组织,加强学生组织的建设和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维护学校稳定的战斗堡垒作用;完善学生组织的沟通机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保障第一时间发现“邪教”活动苗头,压缩其生存空间。

(三) 开展教育转化,促使参与人员“脱邪”

中国政府对待“邪教”参与人员一贯的原则是“把握政策,区别对待”,对构成犯罪的“邪教”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坚决打击,对绝大多数受蒙骗的参与人员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高校。

1、依法依规处理。学校有关部门对于顽固不化、不思悔改的人员,果断采取停课、停止工作等措施,情节严重的交由公安、政法部门依法处理。

2、教育转化。学校实行“一对一、人盯人”教育转化责任机制,由教育转化直接和具体责任人参与“邪教”活动人员进行一对一谈话帮教,通过严肃的政策宣讲,使参与“邪教”人员了解相关法律、政策,认清“邪教”的本质与危害;通过严肃的批评教育,使其明确参与“邪教”的严重性质与后果;通过严格的要求,使其深刻认识,如实报告,划清界限并写出保证。在教育过程中要

把握政策,高度重视甄别真伪,根据涉事程度区别对待,既要讲明政策,严肃批评教育,也要采用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帮助其提高认识,确保从思想深处真正、彻底、全部转化。对于承诺转化、保证脱离“邪教”的人员,实行责任人跟踪帮教和定期回访、定期汇报、建立档案等制度,既听其言,更观其行,确保转化人员“零反复”。

在整治过程中,学校根据其参与程度及身份采取不同措施,对一般参与的学生采取重在爱护的政策,最大程度上保障其学习、生活如常进行;对参与程度较深的学生,停课审查,直至转化完成,目前已全部复课;对骨干成员,除总负责人被公安机关处理之外,8名学生骨干本着“学校是教育人,而不是处理人的场所”的原则,由学校视其态度进行下一步处理;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参与者,停止其发展程序;正式党员参与者视其参与程度给予不同程度的党内处分;由于整治活动正值该校学生年度“创先争优”和奖助学金评定,凡参加“呼喊派”活动及组织的学生,一律暂停其评先及奖助学金获取资格。

四、余论:思考与分析

经过两个月的集中整治,该校反“邪教”传教的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呼喊派”在该校的组织体系基本被摧毁,教育转化工作稳步推进。为了彻底清除“呼喊派”的影响和确保转化人员“零反复”,该校反“邪教”运动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这一传教与反传教、渗透与反渗透的对抗中,包括“呼喊派”在内的“邪教”对高校开展的活动以及高校的应对策略值得人们深思。

首先,如何看待“邪教”问题?意识是实践的先导。反“邪教”,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邪教”。宗教学界常用世俗化理论解释当代世界宗教总的趋势,“世俗化是一个自我限制的过程,它导致了宗教复兴(教派的形成)和宗教创新(膜拜团体的形成)”。¹⁸可以说,新兴宗教与“邪教”都是宗教全球化、世俗化的伴生物。随着宗教世俗化和现代化在当今社会的不断深入,会更大程度地激起“邪教”的反应。宗教社会学认为:“当某些教会衰落时,它们会被其他更卡里斯玛式的、原教旨主义的或单纯更为严格的教会所取代。”¹⁹“邪教”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宗教根源,具有历史长期性的特点。

实际上,“邪教”在民间往往是一种生活常态(所谓“迷信”现象也是一样)。所谓“邪教”,与宗教有着直接关系。当然,在政治作用下,也可以将两者加以分离,故而,在中国语境中,“邪教”主要是一个政治和法律术语。我们认为,“邪教”与宗教的角色往往随着统治者或主流社会的主观意志发生转化(当然也与某一教派自身的活动有关),也就是说,从长时段来看,“邪教”可以转化为宗教,宗教也可以转化为“邪教”,这种转化是以是否为政府与社会认可为标准的。所以,凡是被历代政府、合法宗教和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宗教教派即“邪教”。²⁰一些打着宗教信仰旗号的民

¹⁸ (美)罗德尼·斯达克等著,高师宁等译:《宗教的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67页。

¹⁹ (英)麦克·阿盖尔著、陈彪译:《宗教心理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

²⁰ 刘平:《关于中国邪教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宗教、教派与邪教》,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间香会、善会（实为“迷信”组织）及气功武术团体也往往被政府列入“邪教”行列。当今中国，政治法律对于宗教与“邪教”有着严格区分，这是高校应对“呼喊派”等“邪教”的基本依据，尽管“邪教”参与者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容干涉。

其次，治理“邪教”的思路问题。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的当今与未来，多种信仰、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吸收成为必然，“邪教”组织也会呈现新的、多样的特征，这使人们面对“邪教”的发展态势必须更加谨慎。

因为“邪教”与主流社会不相融合的特性，使得世界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容忍“邪教”组织的存在（包括美国）。在对“邪教”的打击、取缔工作上，中国政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单纯依靠政府能够达到根除“邪教”的效果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以“呼喊派”为例，1983年遭到政府取缔打击不过4年时间，便于1987年再度在河南、浙江等地区活跃起来，近年更是“走出农村，向高校进发”；同时，“呼喊派”虽屡遭打击，骨干也多有被捕，但其影响并无稍减，反而催生出常受教、能力主（全能神）、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被立王、主神教等各种名目的“邪教”。

所以，中国政府与“邪教”之间的斗争往往形成拉锯战，经常出现“邪教”发展、政府查禁、“邪教”再发展之循环往复的现象。陈智敏在《邪教真相》里也说：单纯的“取缔+惩罚+教育”的方法已被事实证明只能治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能否“与时俱进”，更新治理思路，便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中国宗教政策的形成有着自身的历史原因和国际因素。1950年代，西方出台“和平演变”策略，宗教开始作为其“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的工具，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警惕，并有针对性的制定严格的宗教政策，影响至今，而改革开放30多年，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思路是否有改良改善的可能？对于高校而言，由于面对的是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创新“邪教”治理思路更为紧迫。同时，高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聚集地和先进思想的发源地，是否只是一味坚持已经被实践证明只能治标的“取缔+惩罚+教育”的方法？能不能利用优势资源，在应对“邪教”问题上作出有益尝试，依据自身反“邪教”实践，促进反“邪教”理论创新，充实国家和政府反“邪教”理论和治理体系。

再次，治理“邪教”的具体策略问题。在反“邪教”宣传内容方面，该校展开宣传的基本依据是国家和政府认定“邪教”是迷信、社会之毒瘤等内容，例如在其编印的防“邪教”警示教育读本中，介绍“邪教”常用的“骗人”手法主要有：打着宗教或气功的幌子蒙骗人；用治病、免灾诱惑人；用各种把戏吓唬人；套近乎拉拢人；小恩小惠收买人；用暴力手段胁迫人。其中往往缺乏对于师生之宗教信仰的关怀。

在教育转化环节方面，该校采取的是“一对一、人盯人”的责任机制，转化负责人的谈话基本是在“个人基本情况、参与‘呼喊派’组织详细情况、宣讲法律法规、个人态度”的框架内进行，与公安机关讯问社会参与人员的方式并无二致，这就涉及到相关师生的心理承受与未来的反弹问

题——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置不当，会招致后者更为恶意的报复社会。

该校的做法不必随意指责，其做法符合国家和政府打击“邪教”的政策，也即是说，将反“邪教”工作作为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来看待。但“呼喊派”的新动向以及在高校渗透的具体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仍以该校编印的教育读本中“邪教”常用的骗人手法为例，除了“套近乎拉拢人”之外，其他几种几乎没有体现；另外，从该校的参与者情况来看，“呼喊派”成员基本没有违法情况的出现（按，这个“违法”指的是违背现行成文法律，但依据“政策”，只要加入其中就是“违法”，这一空间就是症结所在），加之教育转化负责人自身宗教知识的缺失，很容易出现相关学生质疑“呼喊派”不是“邪教”的情况。如在 XX 学院，一名参与学生就与该院党委书记力辩“呼喊派”不是邪教。

在具体的教育转化环节，我们应该与“呼喊派”的传教策略有针对性的回应，如“呼喊派”多以“家的温暖、兄弟姐妹们的情谊”来吸收信众，迎合人们的需要等情感手段来发展成员。这就需要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冷冰冰的“讯问”、提交保证书为手段来进行转化，否则学生极易出现抵触情绪、拒不配合的情况。要知道，参与学生不仅是学生，也是“邪教”信众。转化其信众的过程不就是使其在情感上摆脱“邪教”、回归报答“党恩”的过程吗？这就需要我们在在这个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同时改良学生的心理素养。

“邪教”的产生有着长期的历史、社会根源，目前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治理“邪教”同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与“邪教”的斗争应树立“持久战”的思想。根据“邪教”向高校渗透的新动向以及所展现出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在包括宗教政策、教育制度以及信仰培育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筑牢防范“邪教”向高校渗透的阵线，有效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一个案重新审视中国宗教政策视域下的诸多宗教、“邪教”问题。

附注：

- 1、本文系与河南某高校教师合作完成，鉴于目前中国形势，由刘平单独署名。
- 2、本文引用的学生“口述”资料出处，鉴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不予注明。
- 3、本文第三部分行文，由于处于“中国语境”，使用较多的官方语言，敬请谅解。

摘要：1999 年起，以法轮功为第一打击对象，中国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反邪教运动”，高压之下，被中国政府认定的各类“邪教”不断改变名目，转换方式，暗中向社会各个层面传教，近年来更出现有组织地向高校传教的趋势。本文以“呼喊派”向河南某高校的传教为例，对“呼喊派”由来及其向高校传教的策略转变加以梳理，描述其向高校渗透的基本情况以及高校的应对措施。在这一传教与反传教、渗透与反渗透的对抗中，有关高校认识到，“邪教”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宗教根源，具有历史长期性的特点，要根据“邪教”向高校渗透的新动向、新特点，在教育广大师生理解接受中共的宗教政策、避免误入“邪教”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本文希望通过这一案例来探讨那些被定为“邪教”的教派在大陆的生存与活动的状态。

关键词：呼喊派；高校；传教；“邪教”